第六届国际历史地理学家讨论会

（美国路易斯安娜，1986年7月19日—26日）

举行国际讨论会是种有效的方法，它使我们摆脱对某些历史地理概念的错误认识。乔·格雷·泰勒（麦克尼斯州立大学）在他的重要发言中，将路易斯安娜的独特性描述为来自西班牙、法兰西和不列颠的影响相互冲突的结果，是政治的、宗教的和社会的冲突的结果。这已经成为一般性的，历史性的解释。路易斯安娜的文化差异很明显地由多种音乐风格和建筑风格（如西班牙殖民地的、法国殖民地的、佐治亚的、邦联的、罗马时代的、古希腊的、哥特式的和意大利式的建筑）表现出来。随着讨论会的进行，大家逐渐找到了美国南部历史地理的线索，对国际上不同的历史地理的研究风格也有了了解。

历史地理讨论会就象美国南部的景观一样．不仅需要准确的了解，更要让人知道它的发展过程。在1973年，英国地理学家协会的历史地理研究组同安大略的历史地理学家达成协议，组织英国加拿大专题讨论会。会议于1975年9月在安大略的金斯顿举行。第二次会议于1977年5月在英国举行。两次会议，特别是第二次，有一些来自其他国家的代表参加。这样，大家决定以CUKANZUS的名义在1979年8月在加利福尼亚召开第三次讨论会，CUKANZUS代表最初的参加国即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以后的会议分别于1981年8月在多伦多、1983年7月在牛津举行，会议吸引了众多的参加者，大家主张下次会议称为“第六届国际历史地理学家讨论会”

果对这类土地进行土壤改良，则要求对过湿润（排水）阶段和土壤水不足时期分别进行水文论证。

评价土壤改良措施对水资源影响问题的研究程度还不足以对各种自然地理条件水资源的各种变化作可靠的预测。

包括作为主要要素的周围环境及其影响要素观测系统，未来的预测和实际的及预测的水状况评价的自然环境监测概念则是这个领域内的最理想的综合科学研究系统的方法概念。

在Ц.Е.米尔茨胡拉瓦等合著的《水资源综合利用和保护中河床和侵蚀过程评价》中指出，河床过程普通理论及其预测和计算方法以及标准文献研究取得显著进展。他们把河床过程的理论、方法和实践情况的发展分三个阶段加以论述。强调指出，必须组织河网河床过程国家观测系统并对实验室研究和实地观测物质—技术基础作彻底整顿。随着新土地的开发，计算和预测侵蚀过程显得愈来愈加重要。中心问题是详细说明侵蚀机制和引起侵蚀的因素、研究坡地径流的搬运能力、侵蚀过程及土壤地质特性。

А.Б.阿瓦基扬等撰写的报告《湖泊和水库的合理利用问题》论述这些水体的共性及其之间的差异和它们的研究状况。湖泊学发展所达到的水平不能认为是令人满意的，因为水资源和水体愈来愈多的被引用到经济活动中，对它们的利用和保护作出科学论证的要求也更加高了。湖泊水平衡的计算精度不高，水体水文情况专业化综合研究的资料也比较少。同时，人为负荷逐渐增加，特别是中小湖泊。

研究水保措施的基础则是对水体水文情况在大尺度气候因素和人为负荷变态影响下可能产生的变化的研究和对预测进行详细研究。湖泊水质和生态状况的预测方法目前还不够发展。评价水体所允许的负荷则是内陆水体水资源合理利用的重要任务。

水库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作者们指出了修建水库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及其重要的国民经济意义。报告中提出了作为设计和论证水库建设合理性时所应遵循的一般原则。

跃辉译自《География и природные ресурсы》1987,No.3

这就是国际历史地理学研究逐步发展的过程。路易斯安娜会议由S．B．希尔亚德（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和R．L．诺思特兰德组织，有九十位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以色列、南朝鲜、南非、西德、英国和美国的代表参加（捷克斯洛伐克、爱尔兰和新西兰报了名却没有参加）。这无疑是一次博采众家之长的国际性历史地理讨论会，相比之下，国际地理联合会所属的空间组织的历史变迁研究组在其存在的八年（1976—1984）中，只在剑桥、布鲁诺(捷克)、华沙和罗马组织过小型讨论会。

路易斯安娜会议的基本论题是美国南部的历史地理。在提交的六十二篇论文中，有三分之一讨论这一主题。以下几位学者的工作使这一主题更加生动：S．希尔亚德带队在密西西比谷地的乡村进行了三天半的野外考察；M．L．柯米奥克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和D．W．戴维斯（尼科尔州立大学）带队考察了阿科迪安娜沼泽；R．赫斯威尔（纳塔尔大学）带队参观了新奥尔良的有轨电车。尽管美国南部那种“月光和木兰花”的浪漫景象已经有了很大改变，论文和野外考察还是展示了更变化多端的、更迷人的现实，强调了历史时期的人口统计和种植园经济的复杂性、宗教的差异，特别是建筑的多样性（我们看到迷人的村镇、种植园的房舍，看到人们在田园中漫步，看到双筒猎枪、谷仓（grenier）和密西西比谷地里的法式房屋，法庭和乡村小店。

我们再看看其他的议题。日程是满满的，同时在六个场所进行座谈，论文涉及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广泛的主题。主要包括：城市规划、城市景观及保护；城市内的社会阶层的分离；近代和当代英国景观和经济；乡村殖民地；采矿业；人口迁徙；美国西部及以色列的历史地理；图集、地图和计算制造图；对卡尔·索尔的评价；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实践。还有两个历史学家，F．帕斯克福（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和M．罗斯坦（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也发表了对历史地理学的看法。此外，会议还举行了三次特别讨论会。在第一次讨论中，委员们回答并解释了历史地理学的系列出版物问题。休夫·普林斯（伦敦大学学院）介绍了《历史地理杂志》和由英国地理学家协会的历史地理研究组主编的《历史地理研究丛书》；迪特利希·丹耐克（格廷根大学）介绍了《聚落研究：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德文）；艾伦·R．H．贝克（剑桥大学）介绍了《剑桥历史地理研究》；R．M．纽考姆（加州大学，北岭）介绍了《历史地理学新词汇》；H．A．博特斯（威斯康星大学，怀特伍德）介绍了美国地理学家联合会的历史地理专业组的《新词汇》。在另两次会上，H．博斯特和戴维·霍恩贝克（加州大学，北岭）主持了关于将计算机应用于历史地理研究的讨论，并预测历史地理学的几个新方向：A．J．克里斯塔法（波特·伊丽莎白大学）希望各国历史地理学家进行更多的交流，主张进行更多“客观的”研究；科尔·哈里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强调历史地理学家与地理学家更紧密的合作，主张进行比较性的、更有意义的、更理论化的研究，他认为按常规方法研究北美的历史地理不一定有前途；而S．希尔亚德却觉得没有必要抛弃传统的方法和方向；戴维·华德（威斯康星大学，曼德逊）提出最具洞察力的观点，他提出历史地理学家应同其他学者一起进行认识论的探讨，他指出某些历史地理研究被当然地看作只注重形式而忽视过程和象征意义的研究，同时他还要求历史地理学家们加强修养，要有更强的时代感。在几位代表简明的发言之后，特别会议便结束了，但在会上提出的观点被认为该会的重要副题。

假设不伤害自信心和别人对该学科的信心，那么对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评价和自我评价就是它发展的前提。科尔·哈里斯预先展出了他主编的《加拿大历史地图集》和他为耶鲁大学出版的唐纳德·梅尼格的三部曲第一部《阿美利加的形状：500年历史的地理透视》做的预告，及时地表现了北美历史地理研究的丰富成果。我们不能自满，同时也不能对历史地理学的未来失望。

在会议的讨论和辨论中有很多智力上的和传统的含糊。代表们经常要求从具体的案例研究中提出一般性的结论，要求对以前随便使用的概念（如“方言”和“居尔特语”）作出明确的定义，要求更理论化或至少用多种学科进行解释（比如，关于美国南部的论文很明显地完全忽视了历史

森林对气候及地理环境的影响

荀红旺*

森林对降水及地理环境有绝对的影响。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当时我还在大学求学期间，就得知德国森林学家已证实"森林是造雨者"，而且对地理环境的生态变化有绝对影响。森林不但影响降水量，更控制了山坡上的土壤侵蚀。故森林有一别名称之为"湖泊"，它能像湖泊那样对河流及广大农田产生作用。若高山上尽是翠绿的森林覆盖成郁闭状（Closed forest），这个可称为"湖泊"的深度，就等于树的平均高度到达其根部的平均深度。这个森林型"湖泊"对气候与降水的作用，因有相当大的弹性而优于真正的山地水库。例如，位于巴西西北部世界上最大的河流亚马逊河，其流量无其它河流可与之伦比，其上游支流象一棵大树的树根，呈扇形密密麻麻分布着，而且河流中的水量都很丰富。我曾亲自到达过其在玻利维亚东北部的各支流，这些河流的水量丰富，且终年变化不大。究其原因，完全是由于存在着目前世界上最大面积的阔叶林。我多次坐飞机经过其上，总是目不转睛地从窗口向下观望欣赏那伟大的林海（forestsea），美丽极了。虽然目前已因为人类的增殖，对它已有破坏，但亡羊补牢犹未晚，只要及时纠正，还是可以补救过来的。

生态学与地理学都是综合性科学，二者要相辅相行，互相裨益。在生态学中，森林是一个重要主角，是生态系统中最大的活生物，唯一能影响气候和其他生物。森林中的气候自成一体，如温度、湿度都与其外界迥然不同。

森林一旦存在，无论是在山上或平地，立刻就会出现各种生物，如飞禽走兽，昆虫细菌，以及水栖类和陆生植物等总称之为野生生物（Wild Life），就有系统而平衡的生存起来，成为一个有规则的生态世界。这个生态世界存在的愈久，其中的变化亦愈复杂。森林是这个生态系统的保姆。它的存在，使各种生物繁衍不辍，更有新种不时出现，否则，一切将化为乌有，山上呈灰黑色岩石，平地变为沙漠，一无生机。仅在内陆水域和湖泊边沿才有少量的少种类的生物。中国

学家关注的奴隶问题）。但最根本的含糊反应在对历史地理的不同理解上。许多论文基于人文现象的分布来表达文化结构，给出人文现象的地图，追踪现象的"根源"和"扩散"。其他论文更侧重历史，以成功地解释过程和描述布局为基础。只有少数几篇论文更进一步地解释了景观的象征意义。由于会议日程限制，这些来自不同方面的观念未能更进一步地交流。作为历史地理学家，如果我们确实想研究历史的结构，那我们就必须在各种会议上找时间反省我们的推理结构。

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考虑一下在国际会议上以某一区域为主题是否合适，也许一个自成体系的主题能提供更多机会比较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比较不同的研究方法，以促进思想的交流。路易斯安娜会议还提出要形成一个制度以促进历史地理学研究国际化。在最近的十几年中，地方的、区域的和国家的历史地理学研究组织已发展起来：每个组织都为自己的成员提供交流的机会；为共同的兴趣组织双边或多方参加的讨论会。路易斯安娜会议是次真正的国际会议，与会者都希望建立"国际历史地理学家联合会"。不过，大会还是决定于1989年7月在以色列召开第七届国际历史地理学家讨论会，由路斯·卡克（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组织。这的确是在历史地理学新方向上又进了一步。

作者：艾伦·R，H.贝克　王均译（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13，2，1987）曹银真校

---

* 荀先生系美籍华人，40年代毕业于西北农学院，曾留学美国并在美国任职。退休后到玻利维亚从事农业开发工作。该文是他给我的来信摘要——陈家振。